

“苏李诗”的用韵特征及《李陵集》成书考论

马燕鑫

内容提要 对“苏李诗”创作年代的考察，可以从词汇、风格、习俗等多种角度切入，而诗韵无疑最具时代辨识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苏李诗”用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断定其作于三国时期。因为其诗在鱼、虞、模韵上界限明晰，不加混淆，与东吴方音相合；且诗中的“山海”一词，也会稽的地理形态相符，其作者或为《会稽典录》中的李陵。

关键词 苏李诗；诗韵；会稽李陵；《李陵集》

《文选》所录“苏李诗”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点，南朝学者多认为即西汉李陵、苏武所作，如裴子野《雕虫论》、钟嵘《诗品序》、萧统《文选序》、江淹拟作《李都尉陵从军》。而颜延之《庭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则对其提出怀疑。可见在南朝时，对“苏李诗”的真伪便有分歧。宋代以来，认为苏李诗是伪作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但对其写作时代却莫衷一是，主要有齐梁作、南北朝作、汉末作、魏晋作、东汉初作、庾信作6种观点^[1]。这6个观点中，齐梁、南北朝、庾信作3种观点已被否定。其余3种观点运用了不同的考证方法，各有所见，但仍未形成定论。本文拟从诗韵的角度加以分析，同时考察其实际作者，并探讨《李陵集》的编纂情况，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所澄清。

一 苏李诗的创作时代

苏东坡认为苏李诗是“齐梁间小儿所拟作”^[2]，章学诚则认为是“东晋而后，南北朝时，或有南朝人仕于北朝，而南朝戮辱其妻子宗族，因伤心而拟为之辞”^[3]。二者不过是想当然之辞，并无坚确的证据。比较来看，逯钦立、马雍二家的考证方法要严谨科学得多。逯钦立《汉诗别录》“辨伪第一”通过征引史实，考订词句，并结合习俗、品目及“中州”“清言”等词句的使用，证明“苏李诗”实为东汉末年文士所作^[4]。马雍《苏李诗

制作时代考》从词类、句法、意境方面论证了“所谓苏李问答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并进一步考察诗中用“子”称谓的情况，定苏李诗为太和、正始中作，即“公历二四〇年间之作品”^[5]。跃进则根据韦昭称引“古诗”，推测这类诗当作于东汉初期^[6]。

从方法上而言，逯钦立、马雍二人的论证诚然严谨，但还不够周密。词语、句法、风格固然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也易被后世因袭摹拟，不能全然作为准确判断作品写作时代的铁证。在考察苏李诗的形式特征时，诸家均没有注意到诗韵的使用情况。实际上，诗韵在断定作品时代上，其准确性更为可靠。诗韵分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汉魏晋宋齐梁的韵部划分越来越细，古人不可能用后人的韵法。并且对于古今韵部有所不同这一事实，直到明代才被学者意识到，故早先的拟古诗，即便风格酷肖原作，但其遵循的诗韵却是摹拟者当时的韵部^[7]。

《文选》所录苏李诗7首，《古文苑》收10首，这17首作品用韵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

《文选》李陵《与苏武三首》：

《良时不再至》韵脚字：臾、蹶、踰、隅、须、躯（虞韵独用）。《嘉会难再遇》韵脚字：秋、悠、酬、愁、缪（缪为幽韵，其余为尤韵）。《携手上河梁》韵脚字：之、辞、思、时、期。（之韵独用）

苏武《诗四首》：

《骨肉缘枝叶》韵脚字：因、人、身、辰、秦、

新、宾、人、亲（真韵独用）。《黄鹄一远别》韵脚字：徊、依、乖、怀、悲、哀、摧、归、挥、飞（徊、摧为灰韵，乖、怀为皆韵，哀为哈韵，依、归、挥、飞为微韵，悲为脂韵）。《结发为夫妻》韵脚字：疑、时、其、辞、期、滋、时、思（之韵独用）。《烛烛晨明月》韵脚字：芳、堂、乡、霜、翔、方、长、央、光（堂、光为唐韵，其余为阳韵）^[8]。

《古文苑》苏李诗 10 首（《凤凰鸣高冈》《红尘蔽天地》残篇 2 首不计）：

《有鸟西南飞》韵脚字：鹰、陵、缙、蒸、胜、乘（蒸韵独用）。《烁烁三星列》韵脚字：生、鸣、零、听、声、庭、丁、星、营、情（生、鸣为庚韵，零、听、庭、丁、星为青韵，声、营、情为清韵）。《寂寂君子坐》韵脚字：芳、香、庠、唱、扬、伤（阳韵独用）。《晨风鸣北林》韵脚字：飞、帷、辉、飞、归、悲、饥（悲、饥为脂韵，其余为微韵）。《陟彼南山隅》韵脚字：阳、翔、徨、长、璋、伤、忘（徨为唐韵，其余为阳韵）。《钟子歌南音》韵脚字：与、庐、居、俱、隅、躯、衢（前三字为鱼韵，后四字为虞韵）。《童童孤生柳》韵脚字：泥、衣、饥、湄、肌、悲、迟、帷、衰、怀（泥为齐韵，帷为微韵，怀为皆韵，其余为脂韵）。《双鳧俱北飞》韵脚字：翔、乡、央、裳、忘（阳韵独用）。《岩岩钟山首》韵脚字：路、素、固、故、祚、暮、步、厝、度、慕（暮韵独用）。《远送新行客》韵脚字：归、悲、辉、迟、薇、飞、谁、依、追、衣、希（悲、迟、谁、追为脂韵，其余为微韵）^[9]。

上列诗韵的情况，尤、幽合用，阳、唐合用，庚、青、清合用，这 3 种情况自汉魏至齐梁均同，不能据以判断写作时代。此外的用韵表现出了明确的时代特征，比如：蒸韵独用是建安以来蒸、登二韵分立的体现，真韵独用是西晋以来真、諄、臻与文欣分立的体现，之韵独用是建安后之韵独立的表现。最值得注意的两点是，鱼、虞二韵分别明晰，脂、微、齐、皆、灰、哈通用。刘宋之前，鱼、虞、模三韵混用不别，至南齐后，鱼韵独立为一部，虞、模为一部，二者界限明晰。脂、微、齐、皆、灰五韵，两汉三国均同用，之、哈二韵时有混入，晋以

后齐、皆、灰三韵与脂、微二韵渐趋分立^[10]。

诗中《黄鹄一远别》《晨风鸣北林》《童童孤生柳》《远送新行客》四篇，脂、微、齐、皆、灰、哈同用不别。而在颜延之、鲍照以后，皆韵与灰哈韵界限明晰，除了个别字（如皆韵的“怀”），二者基本不再通押^[11]。脂、微二韵分开，在刘宋诗人中，颜、谢、鲍混用已少，而在谢庄韵文中，则无一例混用。南齐之后，以皆韵通押灰哈韵者，有谢超宗《昭夏乐》“阶”“怀”，谢朓《高松赋》“怀”，元顺《蝇赋》“怀”，江淹《步桐台》“怀”“阶”、《渡泉峤》“怀”、《休上人怨别》“怀”、《悼室人》“怀”，陆倕《思田赋》“怀”，陶弘景《水仙赋》“怀”、《寻山志》“怀”“谐”^[12]。且也仅限于“怀”“阶”“谐”数字而已，此后未见皆韵与灰哈通押之例。以微韵通押灰哈，仅有江淹《学梁王兔园赋》“归” 1 例^[13]。以灰哈通押微韵，仅有张正见《佳期竟不归》“回”及北朝阙名《道略造像铭》“徊” 2 例^[14]。刘宋以来，诗韵分部渐严，绝少混用。如果苏李诗作于南北朝或齐梁，绝不容许如此押韵。可见“苏李诗”必非刘宋之后所作，苏东坡的“齐梁说”和章学诚的“南北朝说”显然不能成立。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鱼、虞二韵的问题。《良时不再至》独用虞韵；《钟子歌南音》前 3 字用鱼韵，后 3 字用虞韵，也有所分别，不加杂厕；《岩岩钟山首》独用暮韵（暮韵即模韵对应的去声韵）。鱼韵独立为一部，虞、模为一部，是南齐之后才明确分开的。苏李诗这 3 首毫不混淆，区别甚明，似乎是南齐之后所作。但是鱼韵和虞模韵的这种区别在三国西晋之际的吴地方音中已十分明显，周祖谟曾提出这一问题，他说：“陆机、陆云诗文的押韵在各部里比同时代一般的人都宽泛，但是这一部模鱼虞三类分用很严格，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就是一个方音的问题。”^[15]在陆机的韵文中，《吴趋行》《周夫人赠车马》用虞韵，《上留田行》《赠顾彦先》（其二）《白云赋》《怀土赋》用鱼韵，《功臣颂》《愍怀太子诔》用模韵，除了《白云赋》中模韵的“汗”与鱼韵通押一例之外，其他没有混用^[16]。相应的，陆机作品中，暮韵独用，不与御、遇通押。陆云韵文中惟有《悠悠县象》中“煦”一

字为遇韵与暮韵通用，其余均暮韵独用^[17]。再检《韵谱·魏晋宋谱》“鱼虞模”部分中，除陆机、陆云作品外，其余魏晋韵文作品韵脚字在5字以上者共67例，仅有2例独用，即束皙《读书赋》六韵独用鱼韵，曹毗《歌高祖宣皇帝》六韵独用虞韵，其余65例均混用不别^[18]。而苏李诗《良时不再至》3首能够鱼韵与虞模韵有别，不相混杂，显然属于特例；尤其是《岩岩钟山首》，10个韵脚字均为“模韵”对应的去声“暮韵”，无一混用，可见并非巧合，和其他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的用韵比较，这3首诗的押韵明显有吴音特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的韵脚字均为暮韵。辛延年《羽林郎》的韵脚字对鱼、虞、模三韵也注意分别，如：都、胡、垆为模韵，襦、珠、无为虞韵，余、庐、踞为鱼韵，壶为模韵，鱼、裾为鱼韵，躯、夫、踰、区为虞韵。除“壶”一韵稍杂外，其余均不混用。可见，鱼、虞二韵分立，在汉末始露端倪。两汉时代，鱼、虞、模韵不分，因此，至少上举《良时不再至》三诗不大可能是西汉及东汉早期的作品。

综上从用韵情况看，之韵、真韵、蒸韵独用，鱼与虞模韵有别，脂、微、齐、皆、灰、哈韵通用，并结合逯钦立、马雍二家基于风格、词汇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可以初步判定“苏李诗”作于三国之时^[19]。

二 苏李诗的作者

今存李陵录别诗21首，其内容无一与西汉李陵身世相合，自然不是他本人的作品。魏晋时有代言体诗，模仿他人口吻来歌咏其事，如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诗》（原序：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曹植《弃妇诗》《寡妇诗》，徐幹《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左延年《秦女休行》，石崇《王明君辞》等。这些诗都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角的情感或遭遇，是其人生的真实反映。如果说今存李陵诗是魏晋人摹拟李陵语气而写的代言体，那么势必不至与其生平遭遇迥异如此。因此，

现存李陵诗也非代言体。这些作品既非西汉李陵之作，又不属魏晋时期的代言体，那么，很大可能是魏晋时另一李陵所作。

东汉以来，承王莽时制度，“中国不得有二名”^[20]，姓名绝大多数用单字。“李”为常见姓氏，“陵”也非僻字，因此重名“李陵”之人不在少数。同名李陵者，据梁元帝萧绎《古今同姓名录》卷上记载：“七李陵：一字少卿。一晋将。一燕书南皮侯。一冯跋传。一城门校尉，晋人。一出会稽典录。一出列女传。”^[21]除萧绎所录外，《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益州刺史朱辅有从事史亦名李陵^[22]。《古今同姓名录》中属于晋代的有二人，分别是将军和城门校尉，但均为武职之人，未必能诗，可以排除。最值得注意的是出自《会稽典录》的李陵。《会稽典录》为东晋虞预所撰，记载了春秋以降至孙吴时会稽郡的名贤俊士。会稽李陵的生平今不可考，大约是郡县的小吏。《会稽典录》今存佚文涉及72人，其中并非都是闻达显宦，也不乏职位低微者，如孟英为郡掾吏，孟尝为郡户曹吏，梁宏、郑云为主簿，高丰为县狱吏，戴就为仓曹掾，魏徽为功曹吏等，还有“以文章著称”的任奕，“文艺多通”的朱育^[23]。汉末三国时期能作诗文而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并不鲜见，像秦嘉为郡上计掾，仇靖为郡从史，赵壹为郡上计，以及现存大量汉末的乐府和古诗的作者，其姓名当时都不为人知，故钟嵘有“人代冥灭”之叹^[24]。会稽李陵声名湮灭，与这些人情况相类。

逯钦立以《有鸟西南飞》诗中“暮闻日南陵”，考证此组诗与避难交阯之士大夫有关。^[25]此论良是。东汉章帝之前，通交阯唯有海路，始发地在会稽郡。建初八年（83）之后，才开零陵、桂阳峽道^[26]，而会稽仍是赴交阯的海路出发地。《后汉书·桓晔传》：“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27]《袁闳传》：“（弟）忠弃官客会稽上虞……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28]桓晔、袁忠皆是从会稽渡海往交阯。再如虞翻，籍贯会稽，其谪交州，自是从会稽渡海。会稽既为南赴交州的始发地，本地人对此熟知，习见生离死别之景，自然容易有离别伤怀之作。交州作为东吴的属地，军人常有征戍之役，建安十五年（210），“（步

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29]。官员赴交州任职,随从兵吏辞亲友,别故土,跋涉山海,远赴交广,路途艰险,多有性命之虞,其别离之痛,更逾常情。所谓“有鸟西南飞”“暮闻日南陵”,日南方位正在会稽郡的“西南”,因此该诗更贴合会稽人的口吻。

至于逯氏以“山海”二字,指赴交州所经之艰阻^[30],则不确。魏晋以来,凡滨海依山之地皆可谓之“山海”。《三国志·魏志·何夔传》:“迁长广太守,郡滨海。”^[31]《吕虔传》:“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32]长广、泰山在今山东半岛,负海凭山,故称之山海。《晋书·庾亮传》:“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33]暨阳东出,即为会稽。《殷浩传》:“既受削黜,自蒞山海。”^[34]殷浩被徙于东阳之信安县。《王羲之传》:羲之归会稽,与谢万书云,“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35]。暨阳、东阳、会稽皆属越地,同样濒海接山,故称之山海。齐鲁之地本属中原,而东越之地僻处江外,与中州远隔,因此“山海隔中州”的“山海”即指会稽而言。汉末以来,东吴与北方人物往来频繁,《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云:“(孙策谓翻曰)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36]《全琮传》:“是时中州人士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37]盛宪以吴人而被孔融荐于曹操^[38]。南人北人交游颇多,所以《烛烛晨明月》“山海隔中州”云云,当是吴人送友赴北之作。从诗中所涉地理,并结合用韵,可以看出,这组诗中多篇作品与会稽有关。由此推定其作者为会稽李陵,更近情理。

但是现存李陵诗中,有多首词意重复,包括词汇、句式、诗意十分相似。比如《良时不再至》“仰视浮云驰”“各在天一隅”,与《烛烛晨明月》的“仰视浮云翔”“各在天一涯”及《烁烁三星列》的“远处天一隅”相类;《骨肉缘枝叶》“邈若胡与秦”,与《双凫俱北飞》的“一别如秦胡”相类;《结发为夫妻》“征夫怀往路”与《烛烛晨明月》的“征夫怀远路”几乎相同,“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与《陟彼南山隅》的“随时爱景曜,愿言莫相忘”,《烁烁三星列》“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与《晨风鸣北林》的“思得琼树枝,以解常渴饥”,

诗意雷同;《黄鹄一远别》“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与《寂寂君子坐》的“乃令丝竹音,列席无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如出一辙。若出一人之手,必不至此。因此这些诗并非都是出自李陵一人笔下。结合魏晋以来拟古之作的风习,可以断定李陵诗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之作。

魏晋六朝的拟古之作,重在摹拟诗歌的章法、布局、用语、修辞等,并不考求被拟诗歌的作者其生平如何。因此在具体拟作时,往往剿袭原诗字句,或者袭其意而改易其词,其沿袭之迹,一望可知。兹以陆机《拟古诗》为例,如《拟今日良宴会》“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所拟古诗原句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轹轳长苦辛”。《拟青青陵上柏》“方驾振飞辔,远游入长安。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飞阁纓虹带,曾台冒云冠。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原诗句为“驱车策弩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以上2例,拟作大段地摹拟原诗,且意思基本一致,只不过改换字词而已。至于一两句的摹拟,更加俯拾即是。如《拟迢迢牵牛星》“挥手如振素”与原诗“纤纤擢素手”,《拟明月皎夜光》“畴昔同宴友,翰飞戾高冥”“织女无机杼,大梁不架楹”,原诗“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39],末两句连修辞手法都亦步亦趋。再如江淹《杂体诗》之拟诸家作品,皆能见其词语、句式的沿袭之迹,而非叙写被模拟者的生平。这也就是为何拟李陵诗的内容与李陵生平不合的原因。

通过魏晋拟古诗的写作方式来看,李陵诗不可能均出一人之手,其中尚有他人的手笔,故诗意、字句重复至此。

三 《李陵集》的编纂

真正意义上的别集起源于魏晋时期^[40],也就是说开始有明确的搜辑文章、汇为一集的意识。曹丕将徐、陈、应、刘的遗文“都为一集”^[41];曹

植自定文集，撰为《前录》78篇，今尚有序存世^[42]；陈寿著史，编有《诸葛氏集目录》24篇^[43]；陆云《与兄平原书》称“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一十”^[44]；成公绥“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45]；夏侯湛“诗赋辞诔又为一集”^[46]。至于“文章若干篇”的记载，自然是作品汇编后数量的“总计”，故虽尚无“集”之名，已初有“集”之实。或云“篇”，或云“卷”，只是称谓的不同。到沈约撰《宋书》，屡言文集，纂辑之风，由是大兴。

《李陵集》的编纂成集必不晚于刘宋。颜延之《庭诰》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47]所谓“总杂”，是就已经汇编的作品而言。相同表述又如钟嵘《诗品》称古诗，“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48]，自然也是就汇编成集者而言（《隋书·经籍志》有“《古诗集》九卷”^[49]，盖即同类之书）。若是就零散的单篇而言，则再“杂”也称不上“总”了。生于刘宋中期的江淹，其《杂体诗》30首所拟前代诗体，除古诗外，其余均为名家，其文集编定必不会太晚，如上述曹植、陆机生前便已编纂文集。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简称《文章叙录》）便是魏晋别集叙录的总汇，今存佚文尚有诸葛亮、夏侯惠、荀纬、应璩、应贞、韦诞、孙该、杜挚、裴秀、嵇康、缪袭、何晏十二家^[50]，原书所录文集定然更多。编纂文集，名家之文最受瞩目，故其成集必然较早。江淹所拟各家的文集，除刘宋以来的诗人外，之前的名家文集在江淹拟作时肯定早已成集。因此，通过颜延之的话、江淹的拟作，可以推测《李陵集》刘宋时已成集。

古人学习诗文最重要的途径是摹拟经典之作^[51]，而要摹拟，必须观摩前人作品。《隋志》在追述别集的发展时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52]关于别集起源于东汉一说虽然不确，但论述别集编撰的原因是后人“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却符合实际。《隋志》述总集的作用，谓“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53]，别集同样可资后人作文摹拟之用。因

此，名家之集，魏晋之下，纷然而出。李少卿的事迹经司马迁记述，足以引起后世同情，而魏晋以来又有诗作流传，且文辞足悲，对于好古者来说，编纂《李陵集》自然是首要之务。因《李陵集》编成较早，故其中典事才广为后人所援用。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用李陵《答苏武书》“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浦起龙认为：“江文通《上建平王书》已用‘少卿搥心’之语，岂以时流语作典故哉！当是汉季晋初人拟为之。”^[54]正因冠名李陵的诗、书等作品结集较早，所以江淹诗文多次据以为“典”。若齐梁以后始编，文通当时必见之，对于崇古的他，未必肯拟其诗、用其语。故《李陵集》编纂必不晚于刘宋。

如果细味《庭诰》之语，再结合颜延之的生平，可以进一步推断《李陵集》的成书必在刘宋之前。颜延之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入宋时，已36岁。若《李陵集》编成于刘宋时，以他的“好读书，无所不览”^[55]，再加李少卿的盛名，不容不知，并且可以用更加肯定的语气指摘其伪。而他仅怀疑地说这些诗作“总杂不类”“非尽陵制”，其态度针对的更像是流传已久的旧本，而非新出的伪书。因此，《李陵集》的编成必在刘宋之前。考刘宋之前规模较大的国家聚书校书活动，西晋时有荀勖，东晋初为李充。荀勖任秘书监领校书之任在泰始八年（272）左右，并编成《中经新簿》《文章叙录》。陆机在元康八年（298）任著作郎，“游乎秘阁”^[56]。如果荀勖已编就《李陵集》，陆机自当寓目，但未见其言及，拟古之作也无拟李陵之篇；更重要的是，陆机同时之人也未见言及。若《李陵集》在西晋时已成书，又非禁书，必然会流传于世，竟无人语及，可见西晋时尚无《李陵集》之书。东晋初建，偏居江左，动乱之余，典籍残落，“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57]。当时秘府藏书数量，李充以荀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58]，可见其少，故国家开始搜聚图书。东晋立国江南，政府访求图书，主要在吴越地区。会稽李陵的诗篇，当在此时受到注意，并被收辑成集。东晋初年的官府藏

书“淆乱以甚”，恐怕不仅指图书的部居归类，还应包括某些图书的内容凌乱，《李陵集》混杂他人之作，正是“淆乱”之一端。东晋一朝，玄言诗盛行，《李陵集》古朴的诗风不合时尚，虽然成集，也仅束之秘阁，流传未广，更谈不上校理辨正。故百余年后，颜延之见之，遂叹此旧本内容“总杂”，疑为假托。

那么会稽李陵的作品如何被集录成汉骑都尉李陵的文集呢？这是由于同名相混造成的。古代因同名而导致作品及事迹张冠李戴的例子极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马贞《索隐》据《左传》，此“宰我”当为“闾止”，非孔子弟子中“昼寝”之宰我。因二人均字“子我”，故相混淆^[59]。仲尼弟子又有“公孙龙字子石”，而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载“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索隐》误认为赵国之公孙龙即孔子弟子。^[60]王莽时有史岑（字子孝）以文章显，东汉和熹邓后时亦有史岑（字孝山）能文，后人混淆，将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61]。北周“有菩萨戒弟子济北戴逵”贻书高僧慧命，“时或以逵即晋代谯国戴逵”，释道宣从生卒年考辨其非。^[62]唐代诗人韦应物卒于贞元年间，据出土墓志载，七年（791）十一月归葬。^[63]大和六年（832），刘禹锡作《除苏州举韦中丞应物自代状》，显是别一人。沈作喆《补韦刺史传》、辛文房《唐才子传》均误作一人，将“韦中丞”的履历事迹归于诗人韦应物^[64]。

在同名二人的名声迥不相侔的情况下，若乍见名字，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声名藉藉者。提及柳公权，首先想到唐代书法家，不会想到金代高丽的礼部侍郎柳公权；言及徐陵，自然想到的是《玉台新咏》的编者，而非三国东吴与虞翻友善的徐陵；说到成公绥，同样先想到是西晋赋家，而不是南燕慕容超的太史令^[65]。同理，提及李陵，自然首先想到西汉李陵，而非会稽李陵。东晋初，内阁为传世李陵诗文编集时，编者未加深考，径题作“汉骑都尉李陵集”，传抄者又沿而不改，久而久之，习非成是^[66]。至于他人拟作，也编入李陵集内，固然有失察的原因，或许也是以类相从的编集方式造成的。在写本时代的文献传播过程中，将他人拟

作误入作者本集的情况并不鲜见。《陶渊明集》中有《种苗在东皋》一首，据《文选》，实即江淹所拟《陶征君田居》。后人未审，窜入陶集，连苏东坡都误作陶诗而和之^[67]。《李太白集》中有他人拟作，如《笑歌行》《悲歌行》等，龚自珍甚至认为李白集中多伪作，真诗只有百二十二篇^[68]。当会稽李陵的诗作及他人之作被编成《汉骑都尉李陵集》后，流传既久，分辨不易，自然就归到李少卿名下，也就成了江淹拟作、萧统选文的依据了。

如果将苏李诗的时代、作者以及《李陵集》的编纂加以考辨，有助于重新认识苏李诗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助于平息相关的争议。当然，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立项号 13&ZD109）阶段性研究成果]

[1][6] 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2][67] 苏轼：《苏东坡全集》“后集”卷十四《答刘沔都曹书》，上册，第622页。续集卷三《和归园田居六首》其六，下册，第72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3] 章学诚：《乙卯札记》，见《乙卯札记 丙辰札记 知非日记》，第1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25][30]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3—21页，第13页，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 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第67页、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7] 如江淹《杂体诗》即用齐梁韵，不用古韵。只有追和古人的《和陶诗》一类作品才不得不用古韵。

[8][38][39][41][56][61]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第412—414页，第583页，第435—437页、第409—411页，第591页，第833页，第661页，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本。

[9] 章樵注：《古文苑》卷八，《四部丛刊》，第93册，第388—389页、第390—391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案：《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二首，《古文苑》作孔融《杂诗》。逯钦立考定“原属李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11][12][13][14][16][17][18] 于安澜：《汉

魏六朝韵谱》，第1—10页，第261页，第488—489页，第489页，第500页，第216页，第229页，第213—21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附录《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第34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9] 关于苏李诗的用韵，最早注意到的是明清之际的冒起宗，其《韵经辨》云：“世言韵学起于沈休文，余阅李少卿《与苏子卿诗》，首篇皆七虞韵，无一字阑入六鱼者；至次篇纯用四支，三篇纯用十一尤，尤可证载。阅子卿诗，首篇纯用十一真，次篇纯用四支，四篇纯用七阳，独三篇杂用十灰五微九佳四支耳，则韵学从汉代固严矣。”他的观察固然独到，但忽视了苏李诗非西汉之作的的事实，反得出“韵学从汉代固严”的错误结论，可谓翳眼生花。再者他所举的韵目为后世的《平水韵》，与三国时的韵部并不相合，故其分析尚多疏略，不足为据。参见冒起宗：《拙存堂逸稿》“文剩”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册，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0] 班固：《汉书》卷九四下，颜师古注，第381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 萧绎撰，陆善经补：《古今同姓名录》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26][27][28] 范晔：《后汉书》，李贤注，第2855页，第1156页，第1260页，第1526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全集》第8卷，第28—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4][48] 钟嵘：《诗品集注》，曹旭集注，第75页，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9][31][32][36][37][43] 陈寿：《三国志》，第1237页，第379页，第540页，第1318页，第1381页，第92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3][34][35][45] 房玄龄：《晋书》，第1921页，第2047—2048页，第2102页，第2375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40] 刘明：《别集起源琐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4期。

[42][44]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143页，第204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46] 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一一三《夏侯常侍

诔》题下注《文选钞》引臧荣绪《晋书》，第6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7] 李昉：《太平御览》卷五八六，第3册，第2640页，中华书局1960年。案：原刻脱“元”字，据严可均《全宋文》卷三六补。

[49][52][53][58] 魏征：《隋书》，第1084页，第1081页，第1090页，第906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50] 参见吴光兴：《荀勖〈文章叙录〉、诸家“文章志”考》，莫砺锋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第183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51] 参见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第3页、第330—33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4] 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5] 沈约：《宋书》，第189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57]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四部丛刊》，第22册，第74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59][60] 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第2195页，第234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62]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3] 陈尚君：《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

[64] 韦应物：《韦江州集》附录沈作喆《补韦刺史传》，《四部丛刊》，第30册，第56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又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第17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65] 余寅：《同姓名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4册，第95页、第195页、第20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版。

[66] 误题作者之例又如《昨梦录》，明代各本均题“康誉之”，而《四库全书总目》误题作“康与之”，此后沿其讹误者比比皆是。参见顾国瑞：《〈昨梦录〉作者考辨》，《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68]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最录李白集》，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培